

日本國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清東遊日記彙編

王寶平 主編

日本國志

清·黃遵憲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清東遊日記彙編

日本國志

(清)黃遵憲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30.75 插頁 5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ISBN 7—5325—2800—4

K · 321 定價:95.00 元

總序

王寶平

據考古發現，日本列島長期與大陸緊密相連，大約在一萬年以前才逐漸形成目前這種一水相隔的狀態。地緣的相近，決定了中日兩國必相往來，而文字的相親，極大地增加了交往的密度。自古以來，中國的載籍對日本以及中日間的交往可謂史不絕書，它們為我們研究古代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中日關係史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豐富史料。但是客觀地說，這些史料往往帶有中華文化中心的思想，含有不少獵奇、非科學的成份。這可謂中國之日本研究的第一階段。

有明一代，倭寇撓邊，警報不絕，人民的生命財產慘遭塗炭，朝廷統治受到威脅。抗倭鬥爭的需要促使一大批將領幕僚研究日本，從而產生了《日本考略》、《日本一鑒》、《日本考》等一系列研究日本的專著，形成了第一次日本研究高潮。這是日本研究的第二階段。

明亡清興，邊患消除，天下太平，於是日本研究復趨平靜。這時期，通過長崎一隅，中日貿易頻繁，由此誕生了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東洋記》（一七三〇年）、童華的《長崎紀聞》（一七三五年）、汪鵬的《袖海篇》（一七六四年）等一批以日本長崎為背景的著作，^{（三）}以反映中日貿易為中心是第三階段日本研究的特色。

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開始走脫亞入歐之路。日本的變化引起了近鄰中國的關注，有關日本動靜的報導經常出現在報端。^{（三）}初時，清廷對這「蕞爾小國」心存幻想，欲籠絡之為我所用。臺灣一役，日本一開始就訴諸武力，顯示出後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急迫和露骨，朝野為之震驚。緊接着，炮擊江華島、吞併琉球等事件接踵發生，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昭然若揭，迫使中國對之高度警惕。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日本研究漸次進入以防範為主要目的的第四階段。

這階段的前期，即光緒前十年誕生的著作以日本遊記爲主，從李圭的《環遊地球新錄·東行日記》（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起，中經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的赴任日記《使東述略》（附《使東雜詠》，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副使張斯桂的《使東詩錄》（同上）、王韜的《扶桑遊記》（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王之春的《談瀛錄》（同上）、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同上），一直到李筱圃的《日本紀遊》（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大多以日記和詩的形式記錄訪日觀感。這些遊記的作者，有的如王韜、李筱圃純粹爲了遊歷，但有的如王之春本身就是借觀光之名，行偵察之實。^{〔四〕}至於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等外交官，他們雖沒有王之春那樣的直接使命，但中國一八七七年起對日遣使，除管束當地中國商民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藉探彼族動靜，冀可聯絡牽制，消弭後患」。^{〔五〕}因此，可以認爲他們寫的報告^{〔六〕}對朝野認識日本，進而作好防範準備，間接地起到了作用。這些遊記克服了傳統的日本研究者往往沒有親歷過日本的先天不足，是明治維新後中國人從日本傳回的第一批報導，標誌着撫拾傳說的歷史終結，一個面貌一新的研究日本的時代開始了。

光緒十年起，國人的日本研究又有了深化和發展。與浮光掠影的遊記相比，著作中多分設天文、地理、河渠、國紀、風俗、食貨、考工、兵制、職官、外交、政事、文學、藝文等類，對日本進行百科全書式的綜合考察。如姚文棟的《日本地理兵要》（十卷，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和《日本國志》（十卷，同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四十卷，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葉慶頤的《策鰲雜摭》（八卷，同上）、陳家麟的《東槎聞見錄》（四卷，同上）、顧厚焜的《日本新政考》（二卷，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以及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三十卷，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等。這類百科全書式的研究，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大量採擷日本的有關圖籍、統計報表。在今人看來，與其說它們是研究著作，不如說是資料集更爲貼切。時至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手捧這些著作，還不時爲其資料之翔實而心折，爲作者嘔心瀝血的搜尋精神而心動。正因如此，這時的著作往往卷帙不小，傅雲龍和黃遵憲的上述二書分別達三、四十卷之多即爲顯例。以光緒十年爲界，如果說此前的研究以遊歷（感受）爲主的話，那麼此後則長於記載（資料）。這種變化完全符合人們認識事物由表及裏，由淺入深，由單一到綜合的一般規律，清楚地表明中國知識分子決心沉下心來全面、冷靜地認識日本，認真應付來自昔日朝貢之國發出的咄咄逼人的挑戰。

在上述第四階段的日本研究中，還誕生了一批較為特殊的著作——中日詩文唱酬集。與吳汝綸、薛福成、張裕釗並稱「曾門四子」的黎庶昌先後二度出任駐日公使，他在日六年間，主持或參加的中日文人唱酬盛會不可勝數，其中結集出版的就有《癸未重九讌集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戊子重九讌集編》（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己丑讌集續編》（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櫻雲臺讌集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庚寅讌集三編》（同上）等等。

在黎的身體力行下，使館其他隨員亦紛紛響應，大顯身手。其中，孫點為個中翹楚，他個人的唱酬集就有《嚶鳴館春風疊唱集》（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嚶鳴館疊唱餘聲集》（同上）、《嚶鳴館百疊集》（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等數種。

黎庶昌等人熱衷於詩文活動，除了有文人雅興的一面外，作為外交官，自有其良苦用心。在強鄰環伺，國力不濟之時，他欲以詩文廣交朋友，以人格魅力感染別人，從而團結、聯絡更多的日本友人，實現中日聯手抵禦西方列強東侵的外交目標。「大局自關吾輩事，好懷須向素心開」「求友嚶鳴爭出谷，等閒鷗鷺（歐洲與俄羅斯——引者）漫驚猜」「關心最是中東局」等詩句即為黎氏這種心跡的自然流露吧。

除了外交官外，這時期不少寓日文人也積極投入唱酬活動，《蓮塘唱和集續編》（小野湖山，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愛敬餘唱》（大槻磐溪編，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日本同人詩選》（陳鴻誥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扶桑驪唱集》（葉煒編，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等詩集中即留下他們的痕跡。他們與駐日使團一起，一官一民，互為補充，為增加中日間的互相信任、促進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學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八）

正當文人沉浸在詩文唱酬、觥籌交錯之中時，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戰爭不但摧毀了洋務派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也打破了黎庶昌等人孜孜以求的中日兩國唇齒相依、共禦西方列強的美好願望。從此，維繫了千餘年的中日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沉睡的雄獅開始具有了群體意義上的覺醒，一個以強敵為榜樣、尋求民族自強的時代到來了。我們姑且將這一時期的日本研究稱作第五階段。

這時的日本研究以考察記為主，如教育考察記有姚錫光的《東瀛學校舉概》（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朱綬的《東遊紀程》（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等，軍事考察記有張大鏞的《日本武學兵隊紀略》（同上）、丁鴻臣的《四川派赴東瀛

遊歷閱操日記（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等，農工商考察記有潘學祖的《考察東瀛農工記》（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許炳榛的《乙巳考察日本礦務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劉學詢的《遊歷日本考察商務日記》（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等，政法考察記有劉庭春的《日本各政治機關參觀詳記》（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王儀通的《調查日本裁判監獄報告書》（同上）等。此外，綜合性考察記有謝紹佐的《東遊分類志要》（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楊道霖的《日本統計類表要論》（同上）等等。

與以前任何一個階段相比，第五階段的日本研究性質迥然不同，全面學習日本成了主旋律。在維新派眼中，這時的本從昔日的桃太郎一躍而成爲東方的巨人，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下，^{〔九〕}赴日考察風起雲湧。如果說第四階段開啓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日本研究熱潮的序幕，那麼，第五階段則是名副其實的高潮。研究的動機由被動的本能反應——防禦轉爲主動的虛心學習，研究者已從知識分子擴展至所有東渡考察者：官吏、文人、實業家和學生。對中華民族來說，研究日本再也不是抽象的紙上談兵，而是活生生的現實亟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不是一種書齋式研究，而是一種社會運動！

對於上述光緒以來中國人的日本研究著作，最早予以重視並進行蒐集和整理的是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先生，^{〔二〕}他根據這些著作多以「東遊日記」命名的特點，將它們稱之爲「東遊日記」。今天，東京都立圖書館實藤文庫收藏有他積畢生心血蒐集的數千種頗具特色的舊藏，其中，「東遊日記」達二二七種（含民國時期的七十七種），可謂澤被學人。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東遊日記」的名稱雖未必十全，却因其反映了近代中國人大量東渡日本，間接吸收西方文明這一歷史特質而廣爲學界所接受，「東遊日記」遂成了晚清光緒年間至民國前期國人赴日考察、留學的日記、報告和研究著作的總稱。

迄今爲止，學界對留日學生作了大量細緻的調查研究，而對官吏的考察涉足較少。事實上，由於官吏身居官職，思想成熟，在留學生大量回國發揮作用之前，是他們先期引進西方文明，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勿庸諱言，在某些東遊日記中，存在一些浮光掠影、議論膚淺、資料拼湊等弊病，但重要的不是敘述水平的高下，而是他們代表了一個敢於跨出國門，直接去國外感受新事物和新氣象的社會群體，開創了走出傳統思想的藩籬，面向世界的新風尚。這些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面對陌生的異域文明，經受的心靈沖擊程度未必相同，文化認同也不盡一致，但有一點一以貫之：筆叙日

本，意在中國，他們為謀求祖國自強自立的良苦用心躍然紙上。從甲午戰爭到今天，歷史已跨過一個漫長的時段。雖然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事實上我們面臨着與先人相同的一個課題：如何完成現代化事業。因此，這些東遊日記，不僅是中日關係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資料，更是近代中國謀求整個社會形態和文化模式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留下的生動記錄，對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也具有客觀的借鑒意義。

中國自八十年代以來，鍾叔河、王曉秋、武安隆等先生對東遊日記進行了整理與研究，^{〔一〕}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自一九八九年成立起就將東遊日記作為主要研究課題之一，近年又有熊達雲、汪婉等留日博士分別對政法、教育考察記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二〕}這說明該課題正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其史料價值正在進一步得到認識。但是，東遊日記數量龐大，館藏分散，利用極為不便，有鑒於此，我們不揣冒昧，將數年來克服種種困難苦心蒐集的這些資料整理成編，名為《晚清東遊日記彙編》，公諸同道，以期為學界做些鋪墊性工作。本叢書教育考察記部份已由杭州大學出版社先行出版，^{〔三〕}綜合、軍事、政法、農工商考察記以及唱酬等專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續出。每種或輯數人為一卷，或收一人成一書，首冠前言、解題，後附索引，影印時力求保持原貌，個別模糊不清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技術處理。

東遊日記的蒐集與研究，先後列入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一年）、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一九九八年度）以及住友財團的科研項目（一九九九年度），本叢書為其中間成果之一。

注 釋

〔一〕《長崎紀文》，一卷，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童華自序，乾隆中刊本。是書對中國銅商在長崎的貿易、日常生活等情況的描寫，可補其他同類文獻之不足。

〔二〕清前期還誕生了吳江翁廣平撰的《吾妻鏡補》（一名《日本國志》，三十卷，一八一四年自序）一書。這部著作雖非描述長崎貿易的專著，但在卷十三、十六、十七等處多次言及。詳見拙編《吾妻鏡補》——中國第一部日本通史，日本京都，朋友書店，一九九七年。

〔三〕如《申報》在創刊之年頻頻刊登有關日本的消息：「日本使臣至花旗見國君」（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一日）、「日本地震」（四月初八日）、「東洋欲改服色」（四月初十日）、「（日本）博物院」（四月十五日）、「論東洋新造金小洋錢」（四月二十八日）、「論東洋人男女同浴」（四月二十九日）、「東洋改服色」（五月初一日）、「論東洋博物院事」（五月初八日）、「日本治度信息」（五月初八日）、「日本英國近事」（五月十四日）、「日本近事」（五月二十日）、「論東洋新鑄大小銀錢銅錢事」（五月二十一日）、「論日本通商事」（五月二十四日）等等，可謂

日本的一舉一動盡在觀察之中。

〔四〕王之春此行訪日的目的在曾任兵部侍郎的彭玉麟爲王著所撰的《談瀛錄序》中表述得很清楚：「欲防日而不先悉其形勢要害、風俗美惡、政治得失，則無由攻瑕擊隙，以制其死命；而又慮臨之以師旅則易啓爭端，重之以使節則反招猜忌也。思期得一不動聲色、直探巢穴、密訪周覽、洞悉霧情於胸臆者，久之難其選。王爵堂觀察聞命奮袂請行……」

〔五〕《直督李鴻章奏日使大久保抵琅瑤約期撤兵並請遣使駐日本片》，《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卷八頁。

〔六〕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規定「東西洋出使各國大臣務將大小事件逐日詳細登記，仍按月彙成一冊咨送」。《清同光間外交史料拾遺》，第五卷九頁。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一九九一年。

〔七〕黎庶昌：《庚寅譙集三編·題襟集》，四頁、五頁，一八九〇年駐日清使館序刊。

〔八〕參見拙文《晚清文人與日本——光緒年間寓日文人考》，《中日關係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北京市中日關係史學會合編，一九九八年八月。

〔九〕例如，張百熙等提出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規定：「各省辦理學堂員紳，宜先派出洋考察。……歐美各國，道遠費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則斷不可不到……」（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五三三至五三四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鄂督張飭湖北實缺州縣出洋遊歷博覽周諮札）命：「各該員刻日領咨起程，自備資斧，赴東遊歷，毋稍延緩。」（《申報》，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學務處呈覆遵議各州縣派人籌備公款遊歷日本以備充當學董辦法文）（《申報》，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對官紳遊歷作了非常具體的規定。

〔一〇〕實藤惠秀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開始了對東遊日記的研究。如《東遊日記研究序說附東遊日記目錄》（《日華學報》八二號，日華學會，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

〔一一〕鍾叔河：《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王曉秋：《近代中日啓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武安隆、劉玉敏：《嚴修東遊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一二〕熊達雲：《清末中國官民的日本視察》，日本甲府，山梨學院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一九九八年。汪婉：《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的研究》，日本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八年。

〔一三〕呂順長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上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前言

劉雨珍

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明治四年），中日簽訂《修好條規》，規定互派使節，由此揭開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序幕。此後，國人紛紛東渡，或出使，或觀光，或視察，或留學，在對日本進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撰寫出大量日本研究書籍，其中影響最爲深遠，也最爲人們所熟知的著作，當屬黃遵憲的《日本國志》。

《日本國志》共四十卷五十餘萬言，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式著作，曾被譽爲「數百年來匙有之作」（薛福成《日本國志序》），甲午戰爭後又被「海內奉爲環寶」（狄葆賢《平等閣詩話》）。它不僅在戊戌維新運動中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且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國內外學界有關《日本國志》的研究頗多，已取得豐碩成果。（一）值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日本國志》之際，本文擬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本人的一些調查研究成果，分別就《日本國志》的編纂過程、編纂動機、體例特徵、編纂的主要協助者及其影響、版本等問題展開論述。

一、《日本國志》的編纂過程

黃遵憲（一八四八—一九〇五），字公度，號人境廬主人、觀日道人、東海公等，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曾任駐日參

贊、駐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參贊、駐新加坡總領事、湖南長寶鹽法道兼署按察使等職，是近代中國著名詩人、外交家、史學家和維新思想家。除《日本國志》外，還著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日本雜事詩》二卷等。

早在青少年時代，黃遵憲就懷有遠大抱負，立志「要搏扶搖羊角直上九萬里」。(一)他不願意過那種埋頭書齋，皓首窮經式的世儒生活，主張經世致用，認為「儒生不出門，勿論當世事。識時貴知今，通情貴閱世」，(二)欲走出書齋，放眼認識外面的大世界，曾作詩曰：「噫嘻乎儒生讀書不識羞，動誇虎頭燕領徑取萬戶侯。萬戶侯耳豈足道，烏知今日裨瀛大海還有大九州。」(三)所有這一切，都成為他日後中舉後即放棄舉業，長年出使海外的思想基礎。

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發生，黃遵憲開始究心時務，「取《萬國公報》及製造局所出之書盡讀之」。(四)他還遊歷廣州、香港、煙臺、天津等沿海城市，開闊了眼界。生於列強入侵、外患頻仍之秋，黃遵憲逐漸認識到「非留心外交，恐難安內」，與張蔭桓等時務派人士「抵掌論當世之務」，被李鴻章譽為「霸才」。(五)

一八七六年八月，經歷了科場「三戰三北」之痛的黃遵憲參加順天鄉試，終於考中了舉人。是年十二月，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講、廣東大埔人何如璋為出使日本欽差大臣，由於何如璋賞識黃遵憲的才華，加之與黃的父親是世交，遂邀黃一同出使日本。從此，黃遵憲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外交官生涯。

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明治十年）十一月，黃遵憲隨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抵達日本。作為參贊官，黃遵憲在協助何如璋處理當時中日間存在的各種外交問題，如琉球歸屬問題和朝鮮問題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如針對明治政府出兵臺灣、吞併琉球的擴張政策，黃遵憲充分認識到琉球所具有的戰略地位，代何如璋上書總署，主張力保琉球社稷，為中國營造一個安全的外部環境。對於朝鮮當時所面臨的美日叩關的危機局面，黃遵憲特撰《朝鮮策略》一文，建議其「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圖自強」，對朝鮮的開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六)

另一方面，黃遵憲也極力主張中日兩國應友好相處，共禦外侮，為亞洲的穩定和繁榮共同努力。在《陸軍官學校開校禮成賦呈有栖川熾仁親王》一詩中，黃遵憲闡述了中日唇齒相依的近鄰關係，表達了兩國應世代友好的良好願望：「同在亞細亞，自昔鄰封輯。譬若輔車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強，乃能相輔弼。同類爭奮興，外侮自潛匿。解甲歌太平，傳之

千萬億。」(《入境廬詩草》卷三)

與此同時，黃遵憲還廣交日本友人，積極開展文化交流活動。由於德川幕府長期推行鎖國政策，江戶時期日本文人很難與中國文人進行直接交流。因此，對於首屆中華使節的到來，日本文人表現出空前的熱情，「入境以來，執經者，問字者，乞詩者，戶外履滿，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石川英《日本雜事詩跋》(八))，登門造訪者絡繹不絕。尤其是年屆而立、風華正茂的黃遵憲，在公使館中最富文才，更成為日本友人的結交對象，每天都忙得不亦樂乎。其中情形，正如王韜在《日本雜事詩序》中所描述的那樣：「既副皇華之選，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執贄求見者戶外履滿。而君爲之提唱風雅，於所呈詩文，率悉心指其疵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爲金科玉律，此日本開國以來所未有也。」^{〔九〕}對於日本友人攜來的詩文，黃遵憲或爲其修改，或爲其作序作跋，悉心指點，不厭其煩。

在與日本友人交往的過程中，黃遵憲也開始了自己的日本研究。其間情形，正如他後來在《日本雜事詩》定本自序中所述：

余於丁丑之冬，奉使隨槎。既居東二年，稍與其士大夫遊，讀其書，習其事，擬草《日本國志》一書，網羅舊聞，參考新政，輒取其雜事，衍爲小注，弗之以詩，即今所行《雜事詩》是也。^{〔一〇〕}

到日後的二年間，黃遵憲一方面與日本友人廣泛開展文化交流活動，另一方面則對日本社會進行仔細觀察，深入調查。他目睹了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於是萌生了撰寫《日本國志》的念頭。由於此項工作規模宏大，需要耗費大量時日，於是作爲前期準備工作，黃遵憲首先撰寫了《日本雜事詩》。

《日本雜事詩》於一八七九年七月由總理衙門以同文館聚珍板刊印，初版本上下二卷共收詩一五四首，分別從國勢、天文、地理、政治、文學、風俗、服飾、技藝、物產等各個方面，以詩夾注的形式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系統而形象的描述。就內容而言，《日本雜事詩》堪稱《日本國志》的姐妹篇，所不同的是，《日本雜事詩》是採用七言絕句形式的文學作品，而《日本國志》則是採用中國傳統史書中典志體裁的史學著作，由此而言，二者相輔相成而又相映成趣。

《日本雜事詩》刊行後，受到中日兩國文人學者的極大贊譽，日本漢學家石川英在《日本雜事詩跋》中驚嘆道：「上自

神代，下及近世，其間時世沿革，政體殊異，山川風土，服飾技藝之微，悉網羅無遺。而詞彩絢爛，咀英嚼華，字字徵實，無一假借，並對黃遵憲的才能佩服之至：「公度來日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詳確如此，自非讀書十行俱下，能如此乎？」（二）

經過數年的艱苦努力，黃遵憲終於完成了《日本國志》的初稿。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明治十五年）三月，黃遵憲駐日任期屆滿，奉命調任舊金山總領事，他在贈別日本友人詩中咏道：「海外偏留文字緣，新詩脫口每爭傳。草完明治維新史，吟到中華以外天。」（三）詩中所謂「新詩」是指日本友人廣為傳誦的《日本雜事詩》，而所謂草完的「明治維新史」，則是指已經完成初稿的《日本國志》。

然而，在其後駐美的三年半中，由於公事繁忙，黃遵憲無暇對《日本國志》初稿進行修改。一八八五年秋，黃遵憲由美乞假回鄉，決心完成《日本國志》的編撰事業，因而謝絕了新任駐美公使張蔭桓及兩廣總督張之洞之召，「家居有暇，乃閉門發篋，重事編纂」（《日本國志叙》）。這樣，經過近兩年嘔心瀝血的艱苦努力，一八八七年夏，黃遵憲終於完成了這部前後費時八載、洋洋五十餘萬言的巨著。為此，他特作《日本國志書成誌感》（《人境廬詩草》卷五）一詩，以抒發自己的激動之情：

湖海歸來氣未除，憂天熱血幾時攄？千秋鑒借吾妻鏡，四壁圖懸人境廬。

改制世方尊白統，罪言我竊比黃書。頻年風雨鷄鳴夕，灑淚挑燈自卷舒。

詩中，黃遵憲將《日本國志》比作日本的史籍《吾妻鏡》，以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黃書》，明確表示欲借鑒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對中國進行改革的遠大志向。

《日本國志》撰成後，黃遵憲將稿本鈔寫四份，一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送李鴻章，一送張之洞，自存一份。（二）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黃遵憲將《日本國志》書稿交付羊城富文齋刊刻，但此年並未出版。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黃又將書稿郵至巴黎，請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薛福成作序。直到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底左右，《日本國志》才終於得以正式刊行，此時離黃遵憲完成書稿已逾八載。就這樣，從醞釀到正式出版，《日本國志》前後竟然費時十六年之久。

二、《日本國志》的編纂動機

《日本國志》共四十卷五十餘萬言，除卷首中東年表外，全書共分十二志，計國統志三卷，鄰交志五卷，天文志一卷，地理志三卷，職官志二卷，食貨志六卷，兵志六卷，刑法志五卷，學術志二卷，禮俗志四卷，物產志二卷，工藝志一卷。作者採用中國傳統史書中專門敘述典章制度的典志體裁，從各個角度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進行系統而深入的介紹和研究，稱得上是一部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特別是在介紹明治維新的制度改革方面，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官制、文化等各個層面，故黃遵憲亦稱其為一部「明治維新史」。在介紹總結明治維新經驗的同時，黃遵憲還史論結合，與中國的現狀進行多角度對照比較，提出一系列先進的改革主張。

那麼，黃遵憲為何要編纂《日本國志》這部煌煌巨著呢？筆者認為，其動機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參贊官的使命感。

據《清史稿·職官志六》記載：「使臣掌國際交涉，參贊佐之。」規定參贊的主要職責主要是輔佐公使處理各種外交事務。然而，黃遵憲却認為，除此之外，身為參贊官，自己還負有從事日本研究的歷史使命。在《日本國志叙》中，黃遵憲明確表示：「今之參贊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職也」，並引用《周禮·秋官·小行人》：「小行人之職，使適四方，以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為一書，以反名於王」，以及《周禮·春官·外史氏》：「外史氏掌五帝三王之書，掌四方之志」，來具體說明自己的職責。黃遵憲認為，古昔盛時，就「已遣輶軒使者於四方，採其歌謠，詢其風俗，又命小行人編之為書，俾外史氏掌之，所以重邦交，考國俗者」，如今，由於出使大臣忙於各種外交大事，無暇著述，於是採風問俗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在身為僚屬的自己身上，「不從事於採風問俗，何以副朝廷諮諏詢謀之意？」故而將之視為參贊官所義不容辭的使命。

二、對中國人缺乏瞭解日本的強烈不滿。

黃遵憲抵日後，發現日本人研究中國的著作汗牛充棟，而中國人對日本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識，不由得感慨萬端，他在《日本國志叙》中寫道：

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已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

長期的閉關鎖國，使得中國的士大夫們陶醉在天朝至上、固步自封的自滿情緒中，對於外部世界一直漠不關心。遠隔重洋的歐美且不用說，就連僅隔一衣帶水的日本，也將其視作傳說中的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有感於此，黃遵憲認為有必要對日本進行全方位的介紹和研究，以彌補國人對日認識的不足。

雖然鴉片戰爭後，為抵抗外來侵略，有志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着手研究外國，誕生了徐繼畲的《瀛寰誌略》及魏源的《海國圖志》等富有影響的著作，然而，誠如薛福成所言，它們「於西洋絕遠之國，尚能誌其崖略」；獨於日本，考證闕如。或稍述之，而倘恍疏闊，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猶似古之所謂三神山者之可望不可至也」（《日本國志序》）。如徐繼畲的《瀛寰誌略》雖於卷一敘述東洋二國日本與琉球，但竟稱日本是由對馬、長崎、薩峴馬（按：薩摩之譯音，今鹿兒島）三島組成，並用地圖標出，足見當時國人的日本地理知識何等浮淺。而魏源的《海國圖志》亦只是羅列前人的有關記述而已。

與上述情況相比，《日本國志》乃是黃遵憲親自考察日本的結晶，所據材料皆為作者駐日四年間多方蒐集而成，自然與徐、魏的著作不可同日而語。對此，黃遵憲也頗為自信，曾致函日本友人宮島誠一郎，稱《日本國志》「翔實有體，蓋出《海國圖志》、《瀛寰誌略》之上」。（四）

三、明治維新觀的轉變。

黃遵憲抵日後，雖然親身經歷了明治維新後日本社會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化，但他對於明治維新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由懷疑到認同，再到贊美的轉變過程。對此，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定本自序中回憶道：

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咨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不非大夫之義，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

及閱歷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作《日本國志》序論，往往與詩意相乖背。久而遊美洲，見歐人，其政治學術，竟與日本無大異。今年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時與彼國穹官碩學，言及東事，輒斂手推服無異辭。（二五）

由於黃遵憲到日之初，結交的友人多為漢學家，受他們對明治維新「微言刺譏，咨嗟太息」的影響，《日本雜事詩》初版本中「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甚至作詩譏諷維新後的民風衰敗。（二六）

但隨着他「閱歷日深，聞見日拓」，在日後期黃遵憲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認識到正是因為日本革故鼎新，引進西方的各項先進制度，才能做到「卓然能自樹立」，進而堅信中國走向變法也是勢在必然。他曾對何如璋說：「中國必變從西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吾不敢知，要之必變」，並預言說：「三十年後，其言必驗。」（二七）一八八〇年前後，日本自由民權運動方興未艾，黃遵憲「初聞頗驚怪，既而取盧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心志為之一變，以為太平盛世必在民主」。（二八）這種思想轉變使他認識到必須把明治維新的改革經驗介紹到中國，為中國的改革提供寶貴的借鑒，這也是促使他着手編纂《日本國志》的動機之一。

後來黃遵憲出使美英，在與歐美人的接觸中，發現他們對日本明治維新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贊不絕口，更加深了他對明治維新的認識。因此，黃遵憲於一八九〇年在英國倫敦公使館對《日本雜事詩》進行大幅度修訂，刪除了初版本中譏諷明治維新之作，補充了吟誦各種新制度的詩歌，詩的數量由一五四首增至二百首，並以其作為定本。

四、對日本不斷擴張的高度警惕。

明治維新後，日本積極推行富國強兵政策，一方面殖產興業，對內發展經濟，另一方面開疆拓土，對外不斷擴張，一八七四年入侵臺灣，一八七九年強占琉球，進而窺視朝鮮，對中國構成威脅。正如梁啟超所言，黃遵憲著《日本國志》，其用意之一就在於警告國人「日本維新之效成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為吾中國」。（二九）

在《日本雜事詩》定本自序中，黃遵憲回顧道：「維新之初，人們對於日本的走向議論紛紜，有人認為是「外強中乾，張脈僨興」，無法維持多久」，也有人認為能「以小生巨，遂霸天下」。而黃遵憲則以其高度敏銳的洞察力，發現「日本維新以

來，頗汲汲於武事」（《兵志》一），因此極為詳細地介紹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採用西方兵制，設立陸海二軍的過程，並在《兵志》中著錄了有關明治日本軍事的最新統計表三十七個，包括「明治十三年徵兵表」、「六管鎮臺表」、「陸軍編制表」、「陸軍軍費出入表」及「海軍船艦表」等，以期多角度地把握明治初期日本的軍備發展情況。

一八九四年春，薛福成讀罷《日本國志》，對中日兩國的前途頗感不安，指出兩國「自今以後，或因同壤而世為仇讎，有吳越相傾之勢；或因同盟而互為唇齒，有吳蜀相援之形。時變遞嬗，遷流靡定，惟勢所適，未敢懸揣」（《日本國志序》），批評國人對日本缺乏相應的瞭解：「使稽其制而闕焉弗詳，覘其政而瞢然罔省，此究心時務、閱覽劬學之士所深耻也」，並盛贊黃遵憲「可謂閱覽劬學之士」。

不久，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廷統治者的腐敗以及對日認識的不足，致使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被迫與日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屈辱求和。據黃遵憲回憶，當時任總理衙門章京的袁昶曾喟嘆道：「若是《日本國志》能够早流布的話，就可省去對日賠款的二億兩銀子！」^{〔三〕}雖屬事後誇大之辭，但也一語道破《日本國志》所具有的遠見卓識及其覬國價值。

三、《日本國志》的體例特徵

《日本國志》雖然採用傳統的典志體裁，但有不少地方推陳出新，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作為近代中國人編纂的第一部系統研究日本的大型史籍，《日本國志》在體例上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特徵。

一、名從主人，實事求是。

黃遵憲摒棄了中國傳統史書推崇「華夷之辯」的妄自尊大態度，而採取實事求是、平等相待的敘述立場。在《日本國志·凡例》中，黃遵憲批評「以內辭尊本國，北稱索虜，南號島夷」的傳統史筆乃「狹陋之見」，反對將他國之君無端「易其名號」，主張「史家紀述，務從實錄」。在《日本國志》中，按照《穀梁傳》中的「名從主人」原則，「曰皇曰帝，概從舊稱」，且官名、地名、事物名稱，亦「皆以日本為主，不假別稱」。